



# 江海激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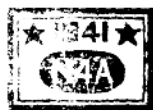
江苏革命印刷史料第三辑

新四军研究会江苏印刷分会编印

# 江海激浪

第三辑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江苏印刷分会编



一九八六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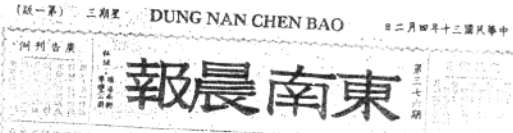
出版事業是精神工作。出版  
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把過  
去的出版事業總結好。就能使現在  
事業辦得更好。因此現在出版界是  
從過去發展起來的。

為江蘇出版題

吳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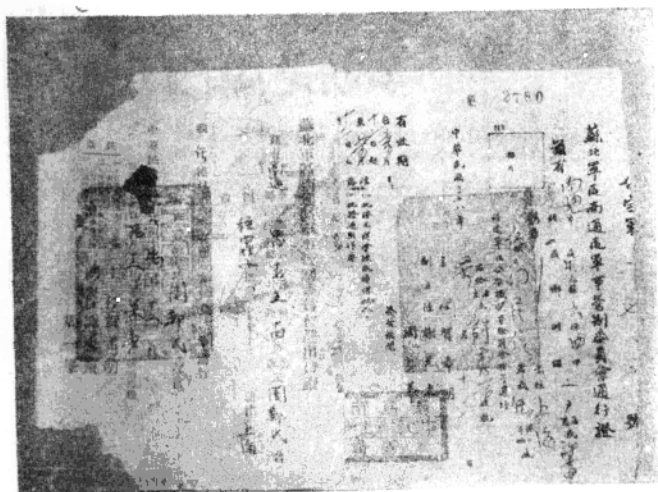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六年九月



新四軍東進后，稻畚印刷廠前身四分區  
印務局印刷的黨報——《東海晨報》



1945年12月9日我厂印刷的《江海导报》，刊登了祝贺韬奋书店和韬奋印刷厂同时成立的祝词。



1949年2月3日南通全境解放，我厂印刷的《新华电讯》和军管会的有关证件。

## 目 录

- 运用报刊指导工作党的传统……………汪海粟(1)
- 范长江同志与华中新华社……………赵元龙(6)
- 风帆,从这里扬起……………徐 熊(13)
- 忆新华日报华中版
- 回忆与希望……………李一氓(25)
- 黎明前的回忆……………李汉章(29)
- 淮海战役支前报导的日日夜夜……………吴以京(37)
- 在蒋军连续进攻中的淮海印刷厂……………秦世民(42)
- 我在《淮海报》的采编生活……………葛雨笠(46)
- 《淮海报》和群众的血肉联系……………魏海平(52)
- 回忆《淮海报》初创时期的电台工作……………韩 韬(58)
- 盐阜印刷厂在战斗中成长……………张学明、李开福、徐开勋(62)
- 忆渡江战役一次采访报导……………徐中海(79)
- 新华日报华中版发行工作片断…印邦昌、包共鸣、蔡 荷(87)
- 周恩来同志与南京《新华日报》……………李 廉、姚北桦(95)
- 从《中央日报》职工的反迁台斗争到南京
- 新华日报的出版……………王智生(101)
- 难忘的摇篮……………王地山(105)
- 记南京新华日报新闻工作人员训练班

- 革命者和他的笔 ..... 孙 瑜 ( 110 )  
     ——回忆徐进同志
- 如果他还健在 ..... 徐中尼 ( 118 )  
     ——怀念徐进同志
- 忆包之静同志 ..... 谢冰岩 ( 127 )
- 可贵的朴实与真诚 ..... 高 斯 ( 137 )  
     ——悼念凌建华同志
- 印刷工人的好领导  
     ——金子明同志 ..... 谭肇之、吴培文、吴以常 ( 141 )
- 怀念吴伯金同志 ..... 黄 仆、杨振基 ( 147 )
- 烽火岁月 转战江海 ..... 朱兴乔、夏玉良 ( 150 )  
     ——记《江潮报》、《江海报》印刷厂的战斗历程
- 三进敌据点 ..... 卢 政 ( 172 )  
     ——为江潮报社购买印刷机
- 满怀激情忆通联 ..... 向 真 ( 181 )
- 镇江前进印刷厂简史 ..... 裴楚江整理 ( 187 )
- 忆《群众导报》诞生 ..... 孙有文 ( 195 )
- 创办油印《前进报》 ..... 程兰芬 ( 197 )
- 我对抗战时期《前进报》和印刷厂的一点回忆 ... 陈云阁 ( 200 )
- 光辉的历程 难忘的战斗 ..... 施明哲 ( 202 )  
     ——回忆前进印刷厂在抗日战争中的片断
- 忆在前进报社的战斗生活 ..... 汪文辉 ( 210 )
- 华丰工人支援武汉新华日报创刊斗争经过 ..... 周洪奎 ( 215 )
- 忆《东台大众》 ..... 乐秀良 ( 222 )

- 华中二分区《前哨画刊》和《前哨画报》……沈毅(229)
- “孤岛”时期向新四军根据地供应书籍的回忆…王泰雷(233)
- 解放战争初期南京印刷工人的一次大罢工……孙顺有(236)
- 坚持在敌后的电台……陈敏(242)
- “银星”和“种子”……成林(251)
- 回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铸字工作
- 《中国地质学》的出版与大庆油田……陈汝言(254)



## 运用报刊指导工作党的传统

汪海粟

一九八〇年再次担任党的宣传工作的時候，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发现党委不大运用党报、党刊指导日常工作了。党报、党刊号称省委的机关报刊，日常工作是由专职的主编、编辑们独立去办。省委、省政府和各个部门指导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发文件。我不知道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有没有普遍性。

回忆建国初期，苏南区党委对于他的机关报《苏南日报》，是抓住不放的，每天的重要报道都要宣传部长看。报纸经常发表社论。社论由宣传部长执笔，区党委书记再仔细看过，然后字斟句酌地讨论修改发稿；往常常委讨论一个问题，最后认为需要写社论，除非机密问题，很少提出要写文件的。因而各地、市、县的负责同志、广大干部，对党报很重视，不是可有可无，可看可不看。因而那时候干部没有浸泡在“文山”、“会海”之苦。我讲的苏南区党委已经是执政党，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这里至少说明党委日常运用报纸指导工作，不是在野党转为执政党以后，这种工作方法有着转变的必然性，恰恰相反，我们已经是执政党了，再也没有人来阻碍我们报刊的出版和发行，可以公开地充分地发挥党报的作用。有人认为让党委负责同志经常亲自动手写文章、写社论，是手工业工作方法，恰恰相反，前一天，有时当天凌晨发稿，同全省

干部和群众见面，这不是手工业方法，是工业化、信息化的工作方法。有人认为，只要从战略方向上给党报党刊工作者作一些原则性的指示，或者让报刊的负责人列席一些党的会议，就可以了，否则会伤害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战略指示，列席党委的会议都是需要的，可是由于党的负责人日常抓报刊的结果，报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重视，报刊的威信大大提高了，报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将发挥得更好。有人认为，在野党、秘密党、甚至建国初期，都没有今天的工作如此繁杂，要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们采取当初那样的工作方法，很难做到。我同样不以为然，正是由于党委不亲自运用报刊去指导工作，问题才愈积愈多，被动应付。我们要求党的负责同志们写的，主要不是那些具体的琐碎的东西，而是着重结合工作，特别是中心工作，从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上谈问题，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谈问题。如果把这些交给具体工作的同志去做，他们只能照搬照套中央的文件、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凡是没有“根据”的话，再也不敢讲，写出来的东西，拿到别的省同样可用。试问这样的文章，还有谁欢迎？天长日久，读者对这份报刊，就怀有成见，不再去看它了。因为它名义上是党的机关报刊，实际上没有做得到，难怪逐渐失去了群众。党报应该有社论、有文章。只有许许多多的报导，当然可以仅供参考，各取所需。党委什么态度，怎么看法？群众不知道。没有社论，没有编者的话，没有许多评论员的文章，一张报纸，象一个人没有眼睛，就显得模糊。话不在多，文章不在长，只要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就行了。一张报纸，一份刊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是不容易的，可是受到人们冷遇是很容易的。受到冷遇、产生成见以后，改变观感，非常困难。

城市的经济改革，必将发展到全面改革。报刊也不例外。看来党报党刊的改变，首先是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问题；其次，公开报刊的改革，是停止公费补助，实行企业化。既然没有人要看，硬性出版下去，或者使劲在趣味性上招徕群众，不如宣告破产。党报、党刊需要改革的方面很多，但核心问题是恢复传统。为什么说运用报纸指导工作党的传统？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新四军皖南军部时代的《抗敌报》，宣传科长兼任主编。社论、重要文章经常是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执笔。远处江南的陈毅同志（当时是党委副书记），也常常给《抗敌报》写稿。全军对报纸很重视，那怕一只歌子，《抗敌报》一发表，全军很快就唱开。华中工委时期，工委书记、宣传部长领导《新华日报》（华中版）的方式，类似《苏南日报》，报纸的大样还要经过宣传部长看过。工委极少发文件，有话直接在报纸上同干部和群众见面。

如果从整个历史来看，就更有说服力了。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推进革命运动，独立创办了《新莱茵报》，马克思担任主编，恩格斯等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新莱茵报》对于马克思学说的宣传，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列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国外同普列汉诺夫等商定了出版《火星报》，整个出版计划都是列宁拟定的。1900年12月《火星报》在第一期报头下面有这样的题词：“行看星星之火，势成燎原之焰”，列宁点燃的星火，终于形成熊熊烈火，把贵族地主的沙皇帝制和资产阶级政权化为灰烬。1912年4月，斯大林、阿尔敏斯基遵照列宁的指示，在国内出版了《真理报》，《真理报》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和支持，尽管反动统治者取缔、罚款、没收，终于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下，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她，成长起一整代革命的无产阶级，成为十月社会主义的主力。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仍然紧紧抓住报纸，指导党和苏维埃的斗争。同

样，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创办了《向导》周报，这个半公开的报纸，对于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过很大作用。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在白区创办了党刊《斗争》，苏区中央局出版了《战斗报》。《斗争》在中央转到苏区以后继续出版。所有这些报刊的多数文章，都是中央领导同志们撰写的。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一段时期内，在延安解放区出版了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和党刊《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了先是长江局、后是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周刊，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过许多著名的社论和用新华社发言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周恩来同志不但抓《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甚至亲自到街头参加发行。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检查、取缔、阻挠、破坏，远甚于十月革命前的《真理报》。群众就是争着看《新华日报》，不要看尽说假话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

党报、党刊为什么失去了或基本上失去了这个优良传统的？可以设想，建国以后，一个接一个的从文化开刀和从民主开刀的政治运动，形成了上面越来越严重的“一言堂”，下面越来越谨小慎微地怕讲错话，在这种情况下，地区报纸早已没有出版的必要了。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同了，应该恢复党的这个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点，是党的领导人亲自办报。随着党政分工的实现，客观条件是更加具备了。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客观条件具备了，主观条件是否具备？是不是谁担任了领导，真理就掌握在谁的手上？这是一种奇怪的提法。第一、党的一些领导人应该是从最优秀的党员干部中产生的。第二、党的领导人洞察全局，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同时经常同党中央保持着联系。第三、谁也不能保证不出差错，错了及时纠正就是了。关键在于党中央的路线。在正确路线的

领导下，大胆放手地工作，改进工作方法，改变思想工作落后于经济工作，精神文明落后于物质文明的现状。

一九八六年五月

## 范长江同志与华中新华社

赵元龙

一九四二年春，敌后抗战处于极端困难阶段，长江同志几经辗转来到华中解放区，路经苏中四分区去盐城新四军军部。我那时在四分区江海报社电台工作，与长江同志只有短暂的接触，五月间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去军政治部报到，辗转两个月才到达盐城附近驻地，经组织部谈话才知道长江同志一到军部就着手组建华中新华社，我就是他指名调去的。从此，我同长江同志就有了比较多的接触。

八月初我去报到，那天长江同志看到我笑着说：小赵，你来了，很好啊，当前的世界战局正处在转折关头，形势瞬息即变，我们想要尽快了解和掌握形势发展的动态，才能在斗争中处于主动，否则就象聋子瞎子一样了。听说你是从上海三级无线电专科学校出来的，能否就用现有机器直接抄收些塔斯社和同盟社等外国通讯社的电讯。那时候的电台机器设备是十分原始的，由三只30号电子管组成的收讯机，只能在晚上才从耳机里收听到延安电台微弱的电波讯号。我自己也还是一个报务新手，所以就胆怯地说：我尽量试试。长江同志听了又接着说：这不要紧，你能抄收多少就收多少，反正我现在主要是想多了解些消息。之后我就按照长江同志的吩咐，把抄收来的同盟社的电讯每天送给敌工部长李亚农同志，塔斯社的英文电稿则直接送长江同志，有时也抄收点美联社的电讯。

长江同志是一位性情豪爽，办事认真，但又很能体贴人的长者。当时电台上手抄外国通讯社电讯的就只我自己，英文电码每分钟总在一百三四十个字母，在豆油灯下听着那蚊子叫一般的讯号声，时间一长就昏昏欲睡，有时眼睛已半闭了，而手还习惯性地随着电码声在纸上划，这时候抄下来的电文常常断断续续重叠在一起，我心中非常不安。每逢这种情况，长江同志总是和颜悦色地说：莫急莫急，我还看得出意思哩。不过小赵，你白天得好好休息，莫贪玩啊。那时我们处于敌后，物质生活很是艰苦，而精神生活则是极为活跃的，我年轻，唱歌跳舞样样都有兴趣。

正是在长江同志积极组建华中新华社的日子里，敌后斗争的形势更加严重了，德国侵略者企图在苏德战场上速胜的迷梦被粉碎了，但斯大林格勒仍在激战中，日本侵略者为挽救败局，加强了对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毁灭性大扫荡，拉网战术、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对付这一严重形势，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英明决策，已在各根据地认真贯彻，新四军军部也不例外，华中新华社那时已经集中了近百干部，但长江同志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毫不犹豫地立即着手精简工作，在短短几个星期里面，除留下我们电台七名报务人员外，把其他人员妥善地作了安排，大部分同志被分派到战斗部队，部分体弱的同志则发给便衣就地打“埋伏”，少数家庭在沦陷区、社会条件又比较好的则动员回家暂住。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了长江同志处事果断和高度的组织能力以及很强的组织观念。

大概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某日，军部直属队处在大转移的前夕，半夜里我正半瞌着抄收塔斯社电讯，突然一条字数不多的电文不断地重复，引起了我的注意，睁眼一看精神大振，原来是一条前所未有振奋人心的大消息，苏军在莫斯科附近的诺

伏哥罗德大败德寇，毙俘德国侵略者三万余。“三万”是我所抄收的战斗电讯中从未出现过的数字，我仔细地校对了好几遍，证明无误，放下耳机，唤醒通讯员急送长江同志，不一刻长江同志自己来了，问我确切不确切，我说已经重复校对多遍了，我话音未完，长江同志就高兴得跳了起来，象个孩子一般，嘴里说着：好样的，好样的，奔出门外跨上一匹白马直向军部首长驻地奔去，我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也高兴得泪水直流。这时天色已呈现鱼肚白，同志们已经在集合准备跑步了，我把纸笔一收，跑出门去也加入了早操行列，一点倦意都没有了。

一九四二年年底前后，寒风凛冽，新四军军部直属各单位精简后，开始战略大转移。长江同志带领我们电台七人随军政治部行动，直指淮南。据说原来打算是转移到大别山区的，但到了淮南根据地情况有了变化。淮南地处苏皖边区，地多丘陵，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是个十分穷僻的地方。罗炳辉师驻防在这个地区，日伪军想侵占这块地方曾吃过不少苦头，这里的群众条件很好，因此，军首长们就决定留驻在淮南地区了。军部驻地离淮南日报很近，报纸和电讯简稿每天都能及时送到，这时，华中新华社实际也已解散，为加强基层工作，长江同志把我派去淮南日报电台，他自己则到淮北新四军四师地区了解那里的敌后斗争情况，分别前，长江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如今敌后形势确实很严重很艰苦，但是日本鬼子这种疯狂的行为，表面上看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其实骨子里是很虚弱的，正说明了它的末日将临。长江同志接着一笑，说：小赵，这两天你不是在教大家唱“加油干”那个歌吗，歌词是怎样说的呢？我说：歌词第一段是：“天快亮时有一暗，事到成功更困难，抗日战争要胜利，我们还要加油干”（这只歌是军文工小组根据形势新作的）。长江同志接着说：是么，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正处在黎明前的黑



暗阶段，黑暗过去了将迎来一片光明，我相信用不了多少时候，我们将会重聚在一起，把华中新华社重新办起来，而且办得更有声色。在十分艰难的斗争形势下，长江同志总是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信心十足，当时对我正确认识形势起着非常大的鼓舞作用。后来的局势发展也正如他所说，一九四五年初，我又奉召回新四军军政治部，在长江同志领导下，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参加重建华中新华社的工作。

有一天，长江同志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告诉你，抗战胜利的日子快要到了，我们得赶快做好进大城市去办报办通讯社的准备，如今干部是个大问题罗。尽管对当时形势我也有所了解，但听他这样一说，我更感到兴奋，急切地问：那我如何作准备呢？长江同志说：你莫急，我已给你安排了任务，准备从华中建设大学调一批学员来办一个新闻训练班，你的任务就是快快把他们当中的一部分青年学员培养成报务干部。当时我还没有搞过训练别人的工作，电台也就我一个人，既没经验又无教材，不知从何着手好，长江同志看我有点犹豫，就说：莫怕么，许多事不都是边干边学起来的吗！接着他就具体地教我如何先订一个计划，把作息时间表定下来，选一正一副学习组长，什么时间上课，什么时间实习，今天学习什么，明天学习什么……经他这么一指点，我心里有底了，信心也产生了，他还说开学的那天就由他来先讲一讲，就这样，几天以后，在一个老乡家的堂屋里办起了报务训练班。待到华中新华社进军淮阴以后，这批学员基本上都可以上台当班工作了。回顾这段历史，长江同志那种循循善诱，对于下级具体帮助的细致作风，使人终身难忘。如果说我在以后的领导岗位上还有某些可取之处，那就是同长江同志的教诲分不开的。

伟大抗战胜利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八月八日苏联红军宣布